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4211
8 October 1980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1980年10月8日
贝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随函送上《历史》杂志(Historia)第406号之二的两份影印本。

由韦隆尼克·维谢尔—邦德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贝宁，一次大胆袭击的凄惨失败”，提供了关于1977年1月16日对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武装攻击行为的许多重要资料。

在安全理事会已经受理的贝宁控诉案的范围内，谨请将题为“博·德纳尔，佣兵生涯二十年”（附件一）和韦隆尼克·维谢尔——邦德特所著题为“贝宁，一次大胆袭击的凄惨失败”（附件二）这两篇文章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临时代办

帕特里塞·洪加武（签名）

附件一*

博·德纳尔，佣兵生涯二十年

阿兰·勒吕著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必须从博·德纳尔开始谈，因为他是法笈雇佣军人里面最家喻户晓、最常为人提到和最引起争论的一个角色。而且，这一点，没有几个雇佣军人比得上他：在他二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他显然赚了钱。这句话说起来当然很容易，但如果要给德纳尔写个正确的传记，要想了解和说明他的事业和行为的全部实情以及他的活动的各个层面，可就完全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他还没有退休，也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身世真象。在这些限制条件下，阿兰·勒吕详细描述了他一生的各种事件，他认识这个人，并且亲眼见到这个人的实际行动和没有行动的生活情况。他报导的这20年（1960—1980）是我们感兴趣的几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会碰到德纳尔，因为不同的作者分别透露了关于他的资料的一鳞片爪，使得他的画象更为完整。

博·德纳尔一名吉尔贝·布热奥，又名让·莫兰，真名实际上是罗贝尔·德纳尔，并且确定是法国笈。虽然因为他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和他早期参加比利时笈的雇佣军，在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对这一点有过怀疑，但是他的口音、象貌和出生证明都说明他是来自纪龙德的法国人。他五十一岁，象一个精力充沛但态度含蓄的公司的经理，外表持重而高贵，言语谨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中饭和晚宴上食量不多。他似乎是个普通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

同他有过密切关系或肤浅关系的少数几个人知道，他这种平静的生活里却满是秘密、各种化名、常常变换地址、高度机密的电话号码和密码。他们也发现，博·德纳尔从不完全和永久信任别人，而总是保留点什么不肯讲。并且他们会碰到他有系统地“分成几个不同部分”的生活，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这些部分。

* 法文原文附有附说明的照片，但不包括在本译文之内。

A. 来自莫多的吉隆德人

罗伯特·德纳尔在1929年的春天生于靠近格拉弗角的勒巴莫多村。他的父亲当时是一个陆军殖民地师的团部军士长，强悍勇敢，近退休年龄。他的母亲是一个温柔爱空想的妇人，喜欢在她的稀有的片刻空间时间看书，溺爱小鲍勃。在他的前面展开的是一个法国农人的生活。

鲍勃在幼年时代是吉隆德沼泽地区的一个尽本分的孩子；他10岁初领圣体，12岁领得小学结业证书。他的世界是乡村，曾在远东当兵，使他有点害怕但也使他极强烈爱好的一个专制的父亲，和永远以女性柔情待他的母亲。他的自然环境是：家庭用的鸭塘，在那里他划着他自己制造的小船一逛就几个钟头；和附近的林地，在那里有“他的”树子，里面藏着他的幼稚的秘密和宝物。

鲍勃·德纳尔的童年时代是短暂的。他在庆祝他的十岁生日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无忧无虑的时代结束了。他的父亲在长夜漫漫的冬天讲个不停的法国陆军被打败了。他看见军队经过，在前往波尔多的路上，蒙受耻辱，溃不成军——一种可怜的景象。若干时间以后，他的幼稚的凝视见识了得意洋洋而又军纪优良的德军先头部队。这种记忆是他永久不忘的。

炮火的洗礼

鲍勃才13岁时，他的父亲加入了游击队，成为一个狙击手和游击队员。因为家长不在家的时间渐渐加长，不在的次数也渐渐加多，这个体格已经长成成年人的青年男孩就接任了家长。繁重的家务琐事他是必须做的，但是他取得了他的独立。德军没有吸引他；妨碍他的自由的是外国占领部队的出现。他同乡村朋友们曾经洗过一次澡的海滩围上了有刺的铁丝，威胁性的布告现在宣布不准进入这个地区。他的父亲对自己的活动守口如瓶，去了又回来不讲一句话，但是鲍勃早已猜出了他的秘密了。鲍勃学他的父亲的榜样，凭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他的”抵抗。

他很偶然地从德国军官的车上偷着了一支轻型自动枪。然后，他同一个朋友放火烧了目的在把联军飞机引入歧途的一些装备；他不顾他的村子和他的家庭会受到的可怕的报复，这样做了。

鲍勃在联军登陆时还不到15岁。不久他就第一次拿起武器并且受炮火的洗礼。当他的村子的居民迁移到波尔多时，他抓着这个机会用伪造文件加入了法国内部部队。那时有若干孤立地区德军抵抗部队仍在激烈作战。鲍勃充当法国内部部队横过格拉弗角沼泽地区的领路人，他对此地区了如指掌。他有资格领到一支步枪，他的第一支步枪。他回到村里时，对他没有给予英雄所受的欢迎。他的父亲虽已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仅说：“你想要当兵，将来就去当兵”。这个诺言必须遵守。父亲把他的儿子送到一个海军工兵学校读书，他17岁时入校。

在这个学校读了18个月的书以后，鲍勃·德纳尔离校前往印度支那，在那里去当一名海军炮手。他的生涯似乎有了规划，正如他父亲过去情形一样。他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我父亲两眼含泪”。

他的勇气和他对军事生活的热情都是不成问题的。那末为什么他在1952年，进海军工兵学校后只有五年，离开了军职呢？

鲍勃是在发现世界，在发现他自己。生在一个朴实的家庭，他已证明了他的英勇，他的决心和他的威力。因此，当他察觉法国海军树立的旗帜击碎了一个青年海军军士的希望和雄心，当他认识到他大概绝不会有机会提升到他的二等海军军士（相等于陆军中士）的等级以上的时候，鲍勃·德纳尔反叛了。他知道他有担任更高职位的才具。而且他也知道他想要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报偿。

在离开海军以前，鲍勃在美国受过训练。他发现了新世界，和另一种现代的更平等的军队。他看见了美国海军军官在费拉德尔菲亚的港口自助食堂里谦逊地同他们手下的士兵们同进午餐；这在法国海军里是难以想象的事。而且他看见了美国繁荣，看见了人人，或者至少表现出勇气和决心者人人都有机会取得的胜利钱财。

他也是具有勇气和决心的人。那末，他回返到欧洲文明世界，也许是遗憾的事。

谋害孟戴斯—弗朗斯

博·德纳尔借着他在美国拉上的关系，而在摩洛哥的一家美国公司里找到一份职业。他的工作——负责安全和护卫——使他经常同法国警署保持联系，因此他就同一些警员建立了友谊。或许他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制服。无论如何，他很快地听从了他的新朋友的劝告，到伊弗兰警察学校选了一门课程。

德纳尔开始了新的职业：担任警员。警察虽然不象海军那么体面，但是较为民主，没有社会障碍，可以一级级地升上去。

尤其是到了1953年，摩洛哥首次遭遇到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在这种混乱危险的时局下，一个果决的、勇敢的而且有野心的人可以更快地展露头角。

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后，他从阶梯的底层开始了他的事业。他担任普通警员，手持白色警棍在卡萨布兰卡的街道上指挥交通。但是，他的进展很快。他的上司认为他的考绩不错；他参加了警署付官竞试获得通过。当时他年仅24岁，在警界有了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加入了一个反恐怖主义的小组，(Lucoter)，这里的活动终于配合了他的好动的性格。

但是，命运显然替博·德纳尔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博喜欢摩洛哥。他有朋友，他第一次认真地恋爱了，然后结婚，成为一个小男孩的父亲。这一次，1954年的年底，命里注定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同事和上司计划暗杀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德纳尔出于团结心，而且他对“这个出卖法兰西帝国的人”存有敌意，因此，尽管他认为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他也没有退缩。¹

¹ 应铭记的是，在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之后，皮埃尔·孟戴尔—弗朗斯即开始了领导突尼斯走向独立的过程，阿尔及利亚战争亦于1954年11月1日爆发。

他被囚禁了14个月，然后受审，被宣判无罪。正是那个时候，即1956年年底，摩洛哥取得独立。德纳尔同所有法国官员一样被遣送回国。

当他1957年3月返国的时候，他的父亲生命垂危。德纳尔由于停止了工作，因而几乎没有收入。他在结婚一年后便离婚，当时是单身。但迁到了其他被遣送回国的一些人。其中有个律师，B上校，替他找了工作，直到他又进入警署为止。这时，他已被降级，他的记录上有了污点——一次耸人听闻的审判和14个月的囚禁。因此，当内政部派他到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担任一项职位时，他听从了他友人的劝告，要求他应得的休假。1958年初，他回到法国，过了几个月，他辞去了警署工作。

经过谋害孟戴斯—弗朗斯的事件后，博·德纳尔变得谨小慎微，他不再跃跃欲动，尽管他仍然经常同Algérie française的某些领导人，甚至Main Rouge的重要人物保持联系。海军和警署的经历没有能满足他的期望，因此，他便计划——很可能不十分情愿地——再一次尝试平民生活。不管怎么样，总是要活的。

所以，这个未来的冒险家当了一个代理人、送货员，又在阿利埃的一家小工厂里当一名修理员，修理家庭用具，其实就是炊事和加热用具。这种平淡的生活不久就变得单调乏味。尽管有一阵子他很喜欢这种他从未真正体会过的生活，但他又变得烦躁不安。因为他已将近30岁了，他感到一事无成。

几乎有两年时间，他就这样地踌躇不前。由于怀着要成功的愿望，他避免同阿尔及利亚惨剧有任何瓜葛，这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和失望，特别是鉴于他在过去那些失败的事业中从未脱逃过。

特兰基埃不收他

德纳尔花了很多时间仔细考虑他的处境和有系统地阅读。对他来说，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一向是很宝贵的资料和思想来源。他究竟在找什么材料？老实说，连他自己都不确定。他在找一些蛛丝马迹好按图索骥。《震旦报》上一篇文章触发了一切。文章中提到加丹加、“恐怖军”，并提到“银柜”先生（别号“穆瓦兹·特使姆贝”）。“银柜”先生宣布刚果加丹加省独立，并同联合国、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及其部队（A. N. C.）冲突²。

奇怪的是他并不完全是受比利时雇佣军活动的吸引。他认为可以在那个据传十分富有、但当时一片混乱的国家有一番作为。“震旦报”上的文章披露了当时加入“恐怖军”的唯一的法国人的姓名——圣保罗的托尼。博放下报纸。他的主意已定：“今天加丹加有一个法国人，明天就有两个了！”

德纳尔确实打定了主意，他已经心无旁骛了。他听说过特兰基埃上校的系统。他在巴黎会见了特兰基埃，但是特兰基埃不愿同他打任何交道，也许因为以前他同博在印度支那所属的蓬夏迪埃突击队有过纠纷。于是博只好另谋出路，而同他的朋友——特别是C. D.³——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他拿着艾伯特·卡隆吉（巴卢巴斯“皇帝”和“南开赛自治州”首脑）的介绍信，乘机前往非洲。南开赛州盛产钻石矿，矿藏之丰富，足以令任何人垂涎。博·德纳尔到达伊丽莎白维尔，他只打算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1961年初，加丹加警察力量正在组织中，但是博几乎全不在意，因为他一心想到南开赛淘金。

两星期后，他身边的一点钱经不住伊丽莎白维尔的阳光而烟消云散。幸而博交了几个朋友。他透过他们的关系结识加丹加内政部长，想谋取一个警察的职位。但是对他来说，从军的经验似乎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² 参看下面：“我们加丹加恐怖军”。

³ 可以告诉想解C. D.之谜的人：这个人所涉的一系列事件，报刊曾广予报道。

他的计划再度落空。在加丹加，警察局只征聘比利时人。他唯一的机会是加丹加宪兵队，他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除非他愿意身无分文地回法国，这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

就这样他被宪兵队长詹森斯少校派到一个机动营里。不过这次他似乎时来运转。由于无知，S 1（加丹加宪兵队总部）的少校给了他一个法国海军拒绝给他的职位。这位少校把“海军军官”的军衔弄错了。在法国海军里，这指的是士官，而少校以为是陆军中的军官军阶，所以给了他一个少尉。经过多次阴错阳差，博·德纳尔终于变成了军官……

扫把军

1961年时，加丹加宪兵从事维持治安的工作，尽量避免同联合国军队发生接触。对这位身居少尉军阶的雇佣军人而言，不论一切别的事情，这是他再度与他的职业见面的机会。

对秩序有所偏好的德纳尔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漫无纪律的军队。由于他一丝不苟——有时过度如此——和他重视纪律、卫生和器材保养的倾向，他在欧洲人中建立起威望（他的营中约有20名欧洲人）。他在非洲人中也建立了威望，而他与非洲人之间由此建立的关系在将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经受到法国海军军官排挤的德纳尔在此与他的加丹加士兵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而亲切的关系。他与他们一起吃饭，并且把餐厅打扫干净。他迅速地把成份复杂的士兵整顿成一支军队。五花八门的军服不见了踪影。士兵们的胡子刮了，面貌也焕然一新。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机动营里面目完全转变了。德纳尔是它的指挥……他开始向上爬了。

1961年7月11日在伊丽莎白维尔举行的独立庆典中，当加丹加宪兵队集队行进经过冲伯总统面前时，只有一个单位是种族混合的，也就是说，部队里带头的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军官。这就是德纳尔的单位。这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打算。但无论如何，冲伯注意到他的单位并指名见他。1961年8月初当联合国强迫冲伯

解散他的欧洲人部队时，博·德纳尔已是他引以为傲的部队——机动部队C——的头领了。他组织这个部队时享受到全部的自由，给予它一个基本精神，甚至为它设计了一个标志——一个巫婆坐在扫把上，因此这个部队被称为“扫把军”。

由于冲伯的命令，博·德纳尔不得不放下他的武器回返巴黎。但是他爱上了这个行业，他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职业。所以，在离开加丹加时，他已下定了尽早回来的决心。

他在加丹加给了自己一个上尉的军阶

几天之后——9月10日——他就回来了，并且立刻取回了指挥的职位。然后他立刻在伊丽莎白维尔同联合国部队进行了流血战斗，并且俘虏了一支爱尔兰部队。德纳尔在一场跟南非人民军的冲突中受了伤，但是他求战心切，所以几周后就又回到部队，但是情况已起了变化。他在与蓝帽特种部队打仗时就已在福尔凯斯指挥官的管辖之下，而福尔凯斯是一个不可易与的人。这位指挥官曾对加丹加的总司令说：“你就是要当我的传令兵，我也不会要你。”

这是极其刻薄的评语，为此他无法被原谅。福尔凯斯和大部分法国军官在加丹加的冒险生涯因此告终。他们回返法国。但是德纳尔却留了下来。他借此机会组织了一个直接跟冲伯联系的部队。而从这时起，他再也没有顶头上司了。

他带领了25名欧洲人和150名加丹加人，成为一支完全自主的部队。由于他的副手跟他一样，军阶也是中尉，所以他“给自己”一个上尉军阶。由此可见其自主的一般了。另外还有两个自主的部队在此时成立，一个是由比利时人施拉姆指挥，另一个是由塔韦尼埃指挥。三个人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整个1961年秋季，这三个集团对南非人民军进行扰乱活动。联合国军队没有干涉。但是蓝帽特种部队于1961年12月突然开始反攻。⁴ 面对着25,000名装备精良的军队，唯

⁴ 见下文：“我们是加丹加的‘鬼见愁’。”

一办法只有撤退和进行游击战。这三个集团因此全力从事破坏，对科卢韦齐的 Union Minière 的桥梁和设施进行埋雷炸毁。以人数来衡量，他们的成就迹近神奇。冲伯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博·德纳尔是他任命的指挥官。

但是，奇迹到底是不可能的。到1962年底，冲伯被迫投降，而雇佣军与他们的加丹加士兵被迫带着武器和行李越境到安哥拉。在那里他们被葡萄牙人缴械。

被隔绝在也门

“指挥官”德纳尔回到法国，渡了几个礼拜的假期，又已整装待发想打仗去了。也门发生了一场革命。埃及人为帮助新建立的共和国已在当地登陆，忠君份子已撤退到山地。他们需要援助。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需要指导员来训练他们的战士使用现代设备。德纳尔接受了向他提出的建议。他的生涯达到了新的阶段。他获得了一个预算，因此可以更加独断独行。军事指挥官变成了公司的董事。他以一贯的特性极有条理、几乎过份琐碎细致地经管这笔预算。

他买了一架DC 4型飞机，以便搭载他和他的人员（代价是每个月1,000美元）前往也门，又买了他们的背包（连打火机、针线包都没短少！）和猎枪（就法国当局而言，这一伙小丑是要首途进行狩猎远征的）。

虽然从物质材料的观点来说，博样样都已考虑周全，但是其外的一切他只好靠运气了，因为也门之行实在是一大冒险。当那架DC 4型飞机在沙漠当中着陆，因为害怕陷入沙地根本没有完全停住就立刻在漫天尘滚中再度起飞时，那些老油条雇佣兵可都各个心情沉重。他们孤零零地留在那里有三天之久，世上的人都把他们忘了，直到突然之间沙漠里奇迹般地充满了黑眼睛，而且有一个声音问他们道：

“你是博先生？”

他们又干等了十七天才同忠君部队建立联系。博和他的人员开始经历难苦的沙漠训练，在沙漠里时间漫漫毫不作数而孤寂是最难涯过的敌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经受不住在也门的僧侣式生活。涯几个月见不着一个欧洲人，而且尤其是见不着女人，真要叫他们发疯了，所以他们非得被尽早遣送回国不可。

博·德纳尔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任务。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或者起码是和他所熟悉的加丹加不同。不须维持秩序，也几乎没有战事。他扮演一个教育者和

参看以下：“为国王到也门去”。

顾问的角色；他说，他的职责属于“社会福利方面多过军事方面”。他编组了一个训练营，让邻近村落的男人前来轮训，使他们学习使用迫击炮和自动武器，但是他也和一名卫生员一道孜孜不倦地作卫生巡回，改善环境卫生、治疗伤创和传染病；盘尼西林是他建立个人威信的最好助手，因为盘尼西林可以给从未使用过抗生素的人们创造奇迹。

但是，1964年他一听说刚果又爆发了叛乱，博·德纳尔丝毫不顾他对也门忠君份子的许诺，对下一步要干的事一点也不迟疑。他坐上第一架飞机赶去巴黎搜索情报。

刚果：掌握全权

冲伯回到了再度流血暴乱的刚果。⁶而且，原先是分离主义者的冲伯已经是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头子。他在1964年12月路经巴黎时德纳尔见了她，并且同意再为他效劳。同时，他又不愿放弃也门，所以他建议福尔凯去接替下他在那里的事。

当他终于回到刚果时，冲伯应允他指挥一个独立的单位，即第七营。但是，那个单位始终没有成立，因此博被编入第六营，在该营他倒是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队，即“第一突击队”。他率领90名欧洲人和3,000名从加丹加和非洲人来的黑人前往东部省的北部。他专心致力于他的任务，把叛乱份子扣留在朋多镇即将处决的许多欧洲人质释放了，又解救了许多被捉到林中拷打的人。

但是，叛乱一被压平，冲伯就不再“如有神助”。蒙博托推翻了冲伯，而德纳尔就到他底下效劳，这样他不久就和加丹加人的新脱离主义倾向以及他一度保卫的人员及事业作起对来。

“利奥波德维尔和它的不正当交易离我有三千公里远，我没有搞政治。”

⁶ 参看以下，米歇尔·霍诺林著，“刚果的恐怖和欺骗”。

今天德纳尔就用这个短短的回答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说他“出卖”冲伯和他以前的加丹加朋友的事。对德纳尔来说，事情是再单纯不过了。

“穆拉姆巴将军——我在巴黎会见穆瓦兹·冲伯时见过他——到我的总部所在地布塔来见我。他对我说：“利奥波德维尔成了无政府状态，国家要怎么搞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蒙博托将军决定用军队夺权。就你而言，只要你愿意，就一切照旧。我会让你主管你控制下地区的军民事务。”因为我不搞政治，所以我同意并继续我的任务直到1966年。”

那就是他的辩词。

德纳尔有几个月甚得蒙博托的宠幸。每一个官方招待会他都随在新领袖的左右。蒙博托仅仅信赖他一个人。他授给德纳尔中校的军衔当第六营营长（该营后来成为第六旅）。

“因此，在军事方面我就获得了全权委托，”他回忆道。

但是，好光景在1966年7月起了变化。德纳尔必须处理加丹加人的第一次叛乱。他的一些欧洲军官对事情的发展不怎么机变，而政治嗅觉又不灵光，竟然全心全意地支持起叛徒。德纳尔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外交手腕，也能表现出确实的温情，这样他就能处理他手下的抱怨，这些手下——他常喜欢说——可不是“儿童合唱团团员”。在那样的场合，他说些中听的话表示和手下是同穿一条裤子。这种天赋的才能对他好几次都很有用，在这第一次的叛乱里也被他派上用场。这场危机在内部解决，没有造成太多的损害。但是，蛀虫已经钻入果实里了。

“冒险”的告终

德纳尔宁要权力和力量，而不要感情。他既不让自己，也不能容忍别人表现出丝毫的懦弱。他从队伍中除掉他所谓的“伤手残臂”，即不受欢迎的人，这占他600个随从中的200人。好一场大整肃！尽管他只有少数忠实的拥护者，但敌人的数目足以和他的野心分庭抗礼。

1967年5月，他一听到母亲的死讯和赶回巴黎。他的离去关系重大。蒙博托的随从们很快就传说德纳尔已经和冲伯会见了。德纳尔至今还否认这件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冲伯设法要再与他见面。

不管怎样，结果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在六月回到利奥波德维尔的时候，人们对他和对整个雇佣军的态度改变了。蒙博托急于讨好进步阵营和非统组织，不愿再和他交往。德纳尔知道他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得到信任了。不过，他还是呆在那里，进行他长期以来所抱的计划——组织一个联合干涉队伍、一个搞“大时代”政变的机动特种队。但是，对他来说，与让·施拉美一样，在刚果冒险生涯已快完旦了。

当蒙博托设法解除施拉美的武装时，博知道他也逃不了。他和施拉美的目标相同，即雇佣军反叛中央政权。

按照相互协定，他们发动了第二次加丹加兵变，这比第一次更加猛烈。德纳尔又如鱼得水了。他在基桑加尼被子弹射进后颈，受了重伤，被撤到罗得西亚。但在索尔兹伯里医院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博又回到安哥拉进行一次最后行动以营救被困在布卡武的施拉美及其随从。结果惨败。他没有获得进行该营救行动所需要的设备，为此施拉美狠狠地责备他。

刚果事件过去了，第一代“骇人听闻”的事迹也完了。

第一次观察形势

德纳尔知道时代改变了，他还没有，完全没有，失去对军事冒险的嗜好，但他

了解现实情况。只要还有时间，他就要改变途径。战争不应该只是带来冒险和创伤。在基桑加尼，那颗从墙壁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他；尽管子弹不是瞄准着他，但也几乎要了他的命——这或许是他所忘不了的警告，特别是在他受到枪伤后受折磨的时候。

博·德纳尔并没有亲身参加比夫拉战争（1968年），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关心这次战争。他无疑是在福卡尔特务机构以及法国间谍和反间谍分部非正式同意下为比夫拉军队搞到一艘船、一架飞机和一些人员。这或许是慢慢改变途径的第一个标志吧。

德纳尔显然是后退一步以观察形势，同时也休息一下。他从来不让自己有休养的时间，现在他觉得厌倦疲劳，不知何去何从。

八年的雇佣军生涯使他声名狼籍，他没有因而感到不快，但却因此陷入窘境。雇佣军是极为有用之才；没有人可以向他们发号施令，特别是在法国境内。他们可以任意抵赖或离职，并千方百计地否认他们受到官方的丝毫掩护。这里所适用的法则是外国兵团所珍贵名言——“请阁下自己设法摆脱困境，别找我麻烦”。如果德纳尔要追求他的事业，他就必须渐渐被人遗忘，慢慢消失踪影。许多人马上会声称德纳尔为法国间谍和反间谍分部以及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秘书处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为了间接回答这个问题，德纳尔断然否认说，他连一次也没有见过雅克·福卡尔。

1960年代后期，这个现在很出名的兵痞退出舞台。在一个时期内，他似乎已经和施拉美、福尔克和其他人一样与冒险生涯断绝了关系。

事实上，博仍然还有一些忠诚的心腹、大小头目、一个真实存在的系统。他还是那样野心勃勃。他找到途径使他不会在财政上跨下来，使他可以到处旅行、接触，从主要报纸和电视台关于地球上各危机重重地区的记者报导中继续收集资料，这些地方随时可能再爆发另一次加丹加、另一次比夫拉和另一次也门事件。

科摩罗：第一种说法

这时，博·德纳尔经营生意，在他的家乡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厂。这当然是他投资的方法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得到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为了更不引人注目地追求其事业所需要的“掩护”。

不过，“生意”进展缓慢。1960—1970年代不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已不复返了。1972年发动了两次反利比亚行动，由被罢免的伊德里斯王供资。德纳尔策划其中一项行动，另一次则由他的官员参加。两次都流产了。两年后，博到中东“视测”。他和库迪雪抵抗组织聚了四个月，但伊朗和伊拉克签了一项协定，使得叛反和他个人的希望都破灭了。

德纳尔并没有忘掉非洲，那里有他的朋友，其中包括某几个国家元首。特别在加蓬，他的意见极受重视，他每年要到利伯维尔以及阿比让和雅温得好几次。博刚愎自用。其他人由于冒险时期结束的事实早已辞去，他仍然注意搜集极小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会带来签定新合同的机会，他的顽冥不灵将会得到报应。

1975年7月6日在科摩罗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结果，四个岛中的有三个岛获得独立。八月，博接到他一位老朋友，前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电话，要他去会见一个来自科摩罗的法国人。

德纳尔当然同意了这次约会……一个月后，即九月五日，他乘坐法航班机到达大科摩罗岛首府莫罗尼。提议的行动很简单。一些年青的科摩罗政治领袖刚刚向封建统治者发动一次小规模的政变，封建统治者的领袖无疑问是艾哈迈德·阿卜达拉，他到他的采邑昂儒昂岛避难。阿卜达拉和他的支持者必需采取中立。

德纳尔派出七个手下，连同他所训练过的五个非洲人。

两个周期后，在副手的帮助下，他从莫罗尼和邻近村庄招兵买马，组成一支科摩罗青年军。他急不及待地运出一些来自法国的工作服，并在9月21日由他的科摩罗青年军向昂儒昂岛发动空降行动，为了谨慎起见，这些士兵的武器都没有装

弹药。这次行动功德圆满。但博的满足很快就破灭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阿里·萨利赫在几个月后变成狂热的科学社会主义者。⁷

德纳尔和阿里·萨利赫的关系急速恶化。一个独裁专制、穷兵黩武，另一个妄想偏执，只是梦想着人民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博感到灰心失望。他爱上了科摩罗，常常展望未来，认为他已找到一个理想的大后方。有什么地方比这些细小、偏僻而又未受破坏的岛屿更适合用来训练新人并准备未来的行动呢？

⁷ 见下文：“德纳尔，科摩罗王”。

吉尔贝先生

此外，人民喜欢“吉尔贝先生”（博采用的名字。他再也不想吸引好奇的人，特别是记者的注意力。）而“吉尔贝先生”也愈来愈喜欢这些平和的、贫穷的人民。跟他一块儿来的七个雇佣兵都回法国去了，但他还是不想离开。科摩罗人不是随处都有的。

曾经参加昂儒昂岛行动的一小撮非洲人和一、二名非军事观察员留驻岛上，而他则频频往返。合同又开始来了——是到安哥拉和依附于安哥拉的小飞地卡宾达去的。形势似乎好转，德纳尔可以放开怀抱，大干一番。他要在卡宾达部署一支队伍，在安哥拉部署另一支队伍，由他两位得力助手分别率领。至于他本人，身为组织头头，他穿梭来往于三个主要的“地盘”和法国之间，协调行动。

然而时势不同了，德纳尔的散兵游勇绝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古巴兵的对手，行动计划于是乎寿终正寝。1976年夏，不轻易认输的博又再回到科摩罗群岛去。好戏在后头：阿里·萨利赫已经召来了坦桑尼亚军官来指挥他的军队。更厉害的是，阿里·萨利赫碰也不让德纳尔碰一下军队。事实上他建立这支军队还不到一年，军队仍然把他当作首领。惊弓之鸟的人民已数不清秘密警察——臭名昭著的莫伊辛突击队的暴行，他们只是想逃之大吉。德纳尔认为他对这一切多少得负上一些责任，何况如今阿里·萨利赫公然与他为敌。只要他还是总统，德纳尔就不能撒手不管科摩罗群岛。

1976年9月初，博离开了莫罗尼。等到20个月之后，他才率领着他的雇佣兵，乘着安蒂内阿号回来。

答复一则广告的四千封应征信

不过，目前德纳尔正在进行另一个重要的计划。目的首先是推翻贝宁的进步的国家元首凯雷库，扶植一个同亲西方的邻国联成一气的温和政府，然后为新政权提供一支长期的总统卫队。⁸若干非洲国家，包括摩洛哥和加蓬在内，都支持了

⁸ 见下文：“英勇突袭的惨败”。

计划好的政变。前景令人兴奋。为这次行动计划组织的队伍不会在任务完成后解散。这支队伍可以变成长期的干涉小组，随时准备支援受到颠覆威胁的友好国家。

博·德纳尔的一个狂想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岂容错过，实在值得碰碰运气。莫兰上校（即将展开的行动计划的代号）和他的手下要冒许多险。首先就是招募新兵。需要体格强健，受过突击队、外国军团或伞兵训练的大汉六十余人。他的一小邦忠实信徒年来日渐减少。有些死去、有些受了伤，（大部分在安哥拉），有些年纪太大了，其他的“卷了铺盖”，有些认为他们花了许多年头当兵发财，但结果却无利可图。

对普通的雇佣兵来说，十年内薪饷几乎没有增加：在也门平均是1,000美元，计划中的行动是1,500美元。而且在那一段时间内美元兑换率跌得相当厉害，这种薪饷实在叫人发不了财。大家都有点儿不满。

德纳尔必须为他的队伍增加生力军。他要招募新兵，大部分是在国家和地区报纸上刊登小广告：“海外警卫公司诚征合格干部，体格强健。以曾于精锐部队服役者为佳……”

四千封应征信涌至哈瓦斯——这间著名的警卫公司刊登的地址。经过精挑细选，最后只是招募了50人。挑选过程严格，但仍不保险。德纳尔并不认识这50“超人”。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他们。即使不是大部分，其中也有许多是未经炮火洗礼的。

他以十来个老手来补充招募的军队。这些老手有时还得屈居于资历较高的“生手”之下，听他们的命令。

科托努惨败

德纳尔惯于事无大小都亲自监督，包括招募新军和在摩洛哥的本古里基地操练新军，但他实在分身乏术。他要同非常高级的人联系，那就是说，他不得不把大

部分的工作委派给手下的人去办。

博将行动计划的技术部分委托给他的主要助手“默西埃司令”，换言之，有六个星期他全权委托默西埃司令去组织一支超级训练有素的队伍。默西埃是位外柔内刚的运动员。他使用海军陆战队的方法，但他在体力方面给予新兵的操练也许不太适合城市游击战的行动计划。

在本古里，除了几名老手和一小撮比利时人以外，新兵实际上互不认识，气氛不大好。因此，1977年1月16日登上德纳尔包下的DC8机的是一群俯首贴耳的家伙。二十四小时后从在科托努着陆的DC7机走出来的是一群疲累已极的人。（别处报道了这次突击失败。这次失败令德纳尔非常失望。）这次事件使他声名大受损害。贬损他的人说得相当斩钉截铁，“老家伙这回完了！完了！”他们这样把他一笔勾销未免过于仓卒。是的，科托努突袭是失败了，在科托努跑道遗下一箱该死的文件这个意外的疏忽也是事实，但还有一小撮轻装的人侵入一个非洲首都四天，了无痕迹地撤出，——这就差不多是一大功绩。无论如何，还有其他的失败。雇佣兵的命运岂不是跟失败的事业连在一起？

吃了败仗但全局未输

虽然博·德纳尔吃了败仗，但并没有输去全局。他对科摩罗不能忘情。

回到巴黎后，他没有意气消沉，反而立即与阿里·苏伊利赫在巴黎的死对头，不到两年以前被他赶出科摩罗的艾哈迈德·阿卜达拉恢复联系。他也与阿里·苏伊利赫的心腹巡回大使伊夫·勒布雷特会面，伊夫曾建议他绑架阿卜达拉。不过，早在科托努行动以前，德纳尔已作了决定。

最要紧的是，博经不起再次失败了。一年多来，他把所有精力、意志都放在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目标——推翻阿里·苏伊利赫上。他曾准备发动一次空降行动，但由于缺乏外来支持，不得不取消；后来又准备发动，由于同样原因又取消了。显然，德纳尔再得不到其“支持者”的信任。不过，他不能也不会就此罢手，承认失败。

他几乎单独策划了第三次行动。自科托努行动以后，许多老手都离开了他，甚至他的付手，“梅西埃指挥官”在第三次计划中也抛弃他，当德纳尔向他透露这个计划的时候，他认为这是疯狂的做法——从法国海岸航行到莫罗尼，中途尽可能不依靠任何港口。

博·德纳尔从艾哈迈德·阿卜达拉得到三百万法郎经费，在策划第三次行动的时候，已用掉超过一半的经费。他曾雇用队伍两次，付给报酬，然后因毁约而不得不付出赔偿。阿卜达拉和其他两名政变资助者，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一个长期居住科摩罗的印度商人，无法拿出更多的开支。德纳尔只有两个选择：放弃或孤注一掷，换句话说拿出一部分自己的钱，把当了18年雇佣兵所赚得的金钱作为经费。他喜欢强调他抵押了汽车修理厂——他唯一正当的生意，因为他不喜欢任何人提到其财富或银行帐户。

1978年5月13日的军事政变大概是博·德纳尔最大的冒险行动，因为这次冒险和胜利由他一手包办。博自己一个人。他坚持在筹备从洛里昂“独航”莫罗尼的计划时，没有任何人支持或同谋。即使法国情报局——其中有他的朋友——

或者知道这个行动，但法国官方还是——或假装还是——不知道蛛丝马迹，并不是说，官方如果知道就不便从中取利。德纳尔很了解这一点。况且，他在这方面一向“与人方便”。

解放者

博·德纳尔在洛里昂买了远洋拖网渔船“安蒂内亚”号，花了许多个星期作好准备，他要搞得万无一失。这次他亲自作出一切决定，检查一切东西，连船身上的一颗螺栓也不放过。在他身边都是可靠的、经验丰富的人，他的朋友，G 指挥官，几名轮机员；全体船员直到出海以后还不知道“安蒂内亚”号的最后目的地。

1978年5月13日，博·德纳尔不仅是胜利者，还是解放者。大科摩罗岛每条村的人民都向他表示感谢，有时达到狂热的程度。博领略到受群众拥戴欣喜陶醉的情绪，他被看作是真主的使者而受到虔诚的穆斯林人民欢迎。德纳尔投入科摩罗的心血，已确实全部得到回报：这位雇佣兵队长沉醉在他所熟悉的气候温和的岛屿和因长期被剥削，贫穷不堪而寻求一名英雄、一名保护者的人民里。博给自己找到另一项使命：重建科摩罗，改革和控制行政机关、警察、法院和经济。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科摩罗的国王，不过49岁的博，认真认为自己与群岛命运与共，在那里找到符合自己的野心的地位。他认为自己终于在非洲找到了第二故乡，或许就是他所梦想的后方基地，而且肯定是他退休养老的地方。科摩罗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这个权利。但国际舆论在注视着；特别是非统组织，进步国家的代言人，对它们来说，德纳尔是非洲的魔星，德纳尔非走不可；这是第三世界承认科摩罗新政权的条件。

就博来说，他退休的时刻还未来临。但对一个总是向知己吐露最怕死在床上的人来说，这可不见得是真的不幸。

阿兰·勒吕克

附件二 *

贝宁 — 大胆的袭击 灰溜溜的收场

雇佣兵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能够打仗和能够守口如瓶。绝口不提是一条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以致许多作战行动都是等到最后一刻，等到突击队在降落沙滩附近或者等到载运突击队的飞机升空后才披露计划、指示和目标。一旦行动开始，超越一切的命令是如果行动失败，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留下物质，不能留下伤员，更加不能留下文件，如果不遵守这个命令，失败将成为明显不过的可耻下场。由是没有雇佣兵喜欢提及贝宁（前称达荷美）——这椿“乱糟糟的事件”。对许多参加该役的雇佣兵，特别是领袖罗贝尔·德纳尔来说，那是一次痛苦的回忆。使他们的回忆感到特别痛苦的是一切有关文件都落在贝宁政府的手中，并登载在一九七七年《非洲—亚洲》杂志上。

“我们离马拉喀什恐怕不远了。”前几天当乌马尔·巴到达营地时便听到一名军官这样说。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点线索。但实际上，他不是很想知道他究竟在那儿。他向来没有查根问底的习惯，在过去十天里，他的问题比平时更少。那一天，他有一个朋友——也是几内亚人——来到达喀尔，对他这样说：

“你是一个普尔人。我们国家塞古·杜尔总统的政府目前怎样虐待普尔人，你也是知道的。如果你想有所作为，我可以教你应当怎样做。”

这位朋友接着出示了一张海外几内亚人大会所签发的卡片。乌马尔·巴没有足够的钱买这张卡片，但这位朋友干脆便将卡片送给他。第二天，这位朋友告诉他应当接受训练，并且有一个友好国家能够给他提供训练。乌马尔·巴早在十年前便离开了几内亚，现在是一名失业的裁缝师，因此他对“到一个友好国家接受训练”并无意见。他就如此这般地打了防疫针，化名，坐上一架马洛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37飞机。同机的还有其他十二个黑种青年在飞抵目的地后，又再经过陆路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位于摩洛哥腹地的一个基地。

* 法文原件载有附解说的图片，译文则从略。

到现在他已在莫兰上校的主持下受训十天了。莫兰上校是白种人，无疑是法国或比利时人，当乌马尔·巴来到基地时，已有二十六个非洲人和六十个欧洲人在那儿了，这还不包括守卫基地的摩洛哥宪兵和管炊事的摩洛哥厨子们。十天已经过去了，但始终没有人告诉他们将要做些什么。但昨天却出现一些新发展。莫兰上校和梅西埃司令介绍一位贝宁人——解放阵线主席韦库先生给大家认识。这位先生将指挥不久便要执行的战斗任务。

乌马尔·巴对这项任务与同塞古·杜尔作斗争之间的关联始终不大了了，但他晓得不久将会被派往贝宁。

对让·莫兰上校——他一个常用的名字是吉尔贝·布戈特，真名是罗贝尔·德纳尔——来说，贝宁是一项必须顺利完成的作战行动。不过，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愈来愈少介入这类行动。自1975年在科摩罗群岛发动政变成功后，他在扎伊尔和安哥拉先后遭遇挫败。但法国的情报和反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和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德纳尔从1976年8月以来一直是他的技术顾问，每月的薪酬是500,000非洲经济共同体法郎——似乎对他仍抱有信心。

摩洛哥和加蓬的支援

他曾小心翼翼地筹划这次行动。鲍勃·德纳尔于1976年11月5日同达荷美解放和复兴阵线签订了一个妥为拟订的合约，在签约以前很久，他即收到145,000美元“侦察任务费用”，并且已经用尽了这笔经费。

通过这项侦察任务，他获悉贝宁的新总统马克思主义者马蒂厄·克雷库在人民和军队中的追随者不多。忠于克雷库的军队约6,000人，散布全国，其中有600名驻于首都科托努。

从这个前提出发，德纳尔的计划非常简单：据他说，他只需用100人左右包围首都，将克雷库及其朋友们中立化，稍后全国其他地方即由来自多哥的军队维持平静。

贝宁的一个邻国同多哥合作，不会构成任何问题。贝宁和多哥两国间的边境冲突事件不断增加已有好一段时间了。关于贝宁不久将侵略多哥的谣言不迳而走，最

后使多哥元首于1972年1月2日同奥马尔·邦戈和鲍勃·德纳尔就所谓“预防行动的必要性”举行了一次会议。

多哥元首奥马尔·邦戈和摩洛哥国王赫辛二世将给德纳尔提供资金，以便对贝宁采取行动。资金将通过FLERD提供，分两期付款，第一期的“行动前”款项为475,000美元，第二期的“行动后”款项为530,000美元，共计一亿美元。就这类行动来说，似乎数额太少了一点。尽管如此，这笔款项——其中一部分存放在卢森堡和瑞士——至少可用来聘请欧洲的雇佣兵。

九十一名雇佣军准备入侵科托努

八十名白人应征者受到考虑；最后录取受聘的有61个。17个要求把钱转到卢森堡的银行——1976年12月24日提出的要求——提出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开始就把钱付给他们：每月的薪给5,000到7,000法郎全部转到在巴黎或各省的银行。总共加起来在十二月份41笔转帐付出了245,000多法郎。

那时候德纳尔招募的雇佣军差不多全部到达摩洛哥的本古里基地。总共有91个人。60名欧洲人训练30名非洲人——在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招募的几内亚国民和贝宁国民——并告诉他们这个突击队的代号：奥梅加部队。

训练特艰苦并且过分军事化。在营地中被分开的“阿尔法”人（黑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气氛不怎么好。大多数阿尔法人从来没扛过枪，受伤的情事常常发生，甚至在白人中间也是如此。在这些条件下，奥梅加队员在训练结束时一个个都精疲力倦。

1977年1月15日，在一个贝宁人名叫“瓦库”的到达本古里营地后一天，毛林“上校”指示他的手下把任何可以用来鉴别他们身份的东西统统丢掉：私人文件或摩洛哥牌子的香烟。下午2时30分他们带着用品上了一架DC-8型飞机，下午9时降落在加蓬的弗朗斯维尔机场，在那里有一架由一个美国驾驶员和一个瑞典机械师驾来的螺旋桨推进式的DC-7型飞机等着他们。

用品都装上飞机之后，飞行员检查飞机；发觉机油的油路有一处漏油。起飞是不可能。该飞机较预订的时间迟了两小时，于上午7时30分降落在科托努。但是德纳尔并没有因为这个意外的故障而过分担忧。他知道在星期天上午那个时候无论怎样，机场实际上都者无人照顾的。在上午11时UTA班机起落之前是没有飞机起落的。

格拉蒂安·波尼翁润饰他的演说词

在 DC-7 飞机上，德纳尔向他的手下发出最后的指示，那些人都坐在机舱的地板上。他很有信心。他的“侦察”报告的结论说：“只要认为行动行得通，政治决心是有的，必要的资源也可以弄得到，成功的机会可以说是百无一失的。”他对他的手下说：“一切都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办成”。

三个小时来攻击和瘫痪总统府，在盖佐的军事营地和克雷库的私人住所。德纳尔主要是指那些以出其不意和杀死 Kerekon 来保证这次行动的成功。

“瓦库”（真名：格拉蒂安·波尼翁）同这些奥梅加队员一起坐在德纳尔的旁边，同德纳尔一样地有信心。一个平凡和做作的人物贝宁前驻布鲁塞尔大使格拉蒂安·波尼翁静静地把他作为“共和国总统，国家和达荷美解放和中兴政府的元首”的第一次演说加以润饰一番。他特别润饰了结束语：“达荷美的孩子们，起来！暴君已经完蛋了！”，飞机渐渐接近科托努。

美国人很熟悉的驾驶着飞机，DC-7 贴着海面 30 公尺逆风飞行。他把飞机降落到主跑道上马上就急刹车，急转弯滑到平常保留给红十字飞机和最靠近机场大楼的民航滑行道。飞机边走着，机门就拉开了。两根竿子着了地，半打穿着工作服的人跳了出来，对大楼开火。

总统不在总统府

在控制塔，贝宁士官长让-巴蒂斯特·法维赶紧冲向电话。在雇佣军冲进他的办公室之前，他有时间接通了空军司令部和军事总队。当他同三个其他的士兵被拖向那架飞机的时候，他看见其他的士兵跑向停在跑道尽头的两辆小型装甲车。在一阵手榴弹和一阵机枪扫射之后，两辆装甲车瘫痪了，40 个雇佣军冲了出来，朝向总统府冲去。

雇佣军，黑人和白人一起（这项行动不惜代价要使它非洲化），沿着通往科托努的海边公路以印度式的队形前进。很快地就到达了它们的目标。大约有一打左右的人留在整队的后面，装架两门81毫米的迫击炮。但是这个行动的后一段就运运不是德纳尔所说的那样“容易”。

总统府的前面有一个大的碎石广场。前头的人马就完全暴露。在得到飞机场射击的电话而戒备起来的总统府卫队的火力下，先头部队就不得不保持它的距离。他们没有进行肉搏战，而是轰击总统府。克雷库的房间甚至被一枚迫击炮弹击中，说老实话，他很可能就在那儿睡着的地就被炸得片碎。

“他很可能就在那儿睡着”。只是……，克雷库不在总统府。虽然德纳尔在他的报告里强调“使”贝宁国家元首“失去作用”的基本重要性，显然他后来对选择“优先目标”的判断力很差。当雇佣军正争夺要占领的一个它的住户已离开了的总统府的时候，克雷库已静静地离开了家，在广播中证明他仍然安然无恙并且呼吁“英勇的贝宁公民打倒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行为”。

雇佣兵之间是一片混乱。那些负责无线电联络的竟忘掉了大部分的通讯频率。他们只能和机场单位联络，根本不知道其它单位在干什么。包围皇宫的部队接到了及早撤退的命令。迫击炮兵一脚受伤而至落后，手中的武器热得烫手。背后两百公尺光景，一些黑人正逐步逼近。他已不能用他的步枪。幸而在他们赶上他时，他发觉这些人原来是阿拉发斯人而不是他原先害怕的贝宁人……

前面不远，一群雇佣兵前突然出现了一辆装甲车。他们手中谁也没有“Energa”型的手榴弹或M. 72型的火箭筒。这一次他们又是很幸运，因为这辆装甲车是由他们的部队在一个小时以前掳获的，但由于没有无线电联络，他们仍不知道！

路上他们载搭了三个受了伤的人，又以民用汽车送伤者到机场。他们要在炮火之中越过一条路。有一个比利时人认为绕过一排房子的话比较容易。后来他被贝宁人所伤，他的同伴再看到他的时候，已是出现在科托努陈尸所的一张照片上，头上中了一枪。现在他们之中大部分都认为，当时他被黑人围困，走投无路，所以宁愿自杀也不要落到他们手上……但谁也不知道在那排房子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溃败撤退

在科托努，雇佣兵继续从左、中、右三路撤退。枪炮声到处可闻，但 这些“奥米加”部队却不是真的被追击。贝宁人继续得到谨慎的掩护，那几名应科拉库的呼吁而拿起武器的“公民”也不见得是特别勇敢。

其中一个叫西尔文·孔兰的确曾手拿武器走出房子，却迎头碰上一群雇佣兵。他毫不反抗，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奥米加部队把他一块带到机场。

格拉蒂安·波尼翁在机场开始惊惶失措。他本来一直谨慎地坐在一些箱子上面。现在他授意飞行员起飞，美国人嫌他麻烦，往他脸上打了一拳，他只好再坐到那些箱子上。无论如何，即使飞行员愿意照办的话，当时也是不能起飞的。丹纳德在非洲的长期经验使他学乖了，他已在飞机轮子前面停了一部吉普车以防万一……

鉴于当时机场内一片慌乱，这实在是想得很周到的作法。 奥米加部队在撤退时带着所有的物资，然后被命令放弃这些物资：81厘米口径的迫击炮和装在跑道上的两台12.7的机枪以及很多箱子弹、手榴弹、火箭筒和广播设备等。 另一个惊惶失措的迹象就是：他们让控制塔的四名士兵离开，但却小心地把“证人”孔兰送上飞机！

到了上午11时，飞行员最后获得命令起飞。几名贝宁枪手向飞机开火，飞机的门都开着，从离地五公尺转向海面飞去。 但没有人受伤，轮胎也没有中枪。这次起飞真有点象一个奇迹。 甚至连奥米加部队也不能信以为真。 他们已经想象自己在多哥的丛林中日以继夜地奔走，由一群贝宁人在背后穷追不舍。

被遗忘的迫击炮盒子

如释重负的感觉大概出现了半个小时。他们在照顾受伤者，和侍候一名心脏病发的枪手……然后，丹纳德走到其中一人面前。 他在找一箱文件。 不是一个衣箱……不是一个柜子，而是一个迫击炮的盒子，他曾把与这次行动有关的所有文件都塞在里面，他只把自己的名字“莫连上校”贴在盒子上。

炮弹箱？当然。它是同别的箱子一道卸下来的，还在机场上，就在跑道中央……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在清点人数时，梅西埃发现除了有一黑一白两人死亡掉了队以外，有个阿尔法小组失踪了。

乌马尔·巴在机场的一坐屋顶上架着一部机关枪驻守着，把雇佣兵撤退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午10时30分左右，他看到众人齐集在跑道上，便也离开岗位凑热闹去，可是却在楼梯间底下碰到心里没有好气的队长……“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屋顶上去！”

乌马尔乖乖地上去守住他的机关枪。

过了不久，他看到飞机起飞。贝宁人攻进机场。他们迅速上了屋顶，找到乌马尔，把它带到凯雷库那儿去，说也奇怪，凯雷库看来并不急着伤害他。一个星期以后，巴才知道那些人是想叫凯雷库伤害他。科托努有许多外国官员来来去去，显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派来的。他们检查着每一个弹孔，每一个炮弹破片；他们接二连三地到他的牢房不断地问他同样的问题。问完了话，便到陈尸所去，不厌其烦地检查在军事行动中被杀的雇佣兵尸体。

巴以他特有的方式成了凯雷库所说的“帝国主义困兽之斗的凶残侵略”的活见证。他只是不愿意整天再三复述已经列入官方记录的话：“我被政客骗了。我良知仍在，因我没杀过人。谁都有可能象我这样被骗的。贝宁人民共和国万岁！非洲人团结万岁！”

奥梅加小组搭上载着子弹的DC-7式飞机回到加蓬，受到冷淡的待迁。他们在利伯维尔机场荒僻的一角降落。过了不久，他们奉命到弗朗斯维尔去，大约在那儿呆了十天才又回到利伯维尔渡过“减压阶段”：在没有水没有卫生设备的荒废基地上渡过了十天。

他们无论到那儿去都带着“犯人”西尔万·科朗，他看来毕竟对新情况适应得蛮好的。到了科托努，有几个雇佣兵开始揍他，被德纳尔挡住，以后也就没有人

再打他了。他只是跟着尽“疲劳责任”。他愿不愿回科托努去呢？他说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他怕被当成叛徒，当他到了那里以后，便趁机离开他太太。被凯雷库称呼为“战友”的科朗在非洲索马里或尼日利亚某地有一些亲戚。有一天德纳尔给了他一张机票，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起码，这是雇佣兵今天所供述的。

这是该事件仍然不能搞清楚的几点之一。

此外，德纳尔在科托努遗失的大宗文件是到目前为止所能获得的、有关雇佣兵军事行动的最周详的资料。¹

凯雷库透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切：乌马尔·巴的证词；进攻科托努的全部军事行动计划；德纳尔同弗莱尔（FLERD）签订的合同；波尼翁的“祝捷”演说；薪饷单；雇佣兵名单，雇佣兵的真实姓名，过去的勤务记录，每个雇佣兵所收到的金钱数额和他们的银行名称；证明奥马尔·邦戈和总统侍卫长路易·马丹上校²同博·德纳尔曾经进行交易的文件；德纳尔的银行存摺；乃至雇佣兵的种痘证明（有些是在象牙海岸核发的）！

总之，摩洛哥、加蓬、多哥、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法国都脱离不了干系。二月二十一日，非统组织第二十八届会议在洛美召开，当它受理科托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时摩洛哥代表退席了。对凯雷库来说，那是一次从事拯救和宣传的荣耀的军事行动。

¹ 说也奇怪，当《非亚杂志》刊布档案资料时，却没有说明莫兰上校和德纳尔的关系。

² 我们指的是“路路”，马丹这位第一个外国空降兵团的大闻人（参看空降兵问题）他仍是总统的侍卫长，官拜陆军上将。他一手掌管加蓬的精锐部队，空军特务更是不在话下。

* 本文所载材料摘自《非亚杂志》。不准翻印。

至于德纳尔，他已回到法国，许多老同志有些唾骂他，或多或少厌弃了他，可正是三年前被德纳尔亲自推翻的艾哈迈德·阿布达拉在几个月后却又找上他的门，非洲仍然需要着他。

韦隆尼克·维歇尔·邦德
